

史學集刊

第一期至第二期

國立北平研究院
史學集刊編輯委員會

顧頡剛(委員長)

李書華 徐炳昶 孟 森 張星娘
陳 垣 沈兼士 洪 業 常 惠
吳世昌 何士驥 (以上委員)

史學集刊第二期

目 錄

論文

- 論語一名之來歷與其解釋 趙貞信
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 楊向奎
丁零民族史 王日蔚
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 羅香林
日本國號考 王輯五
墨子姓氏辨 顧頡剛
書後 吳世昌
清咸豐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記一篇 孟 森
同治五年黃崖教匪案質疑 劉厚滋
柳三變事蹟攷略 潘承弼

書評

- 周叔迦：唯識研究 朱寶昌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 吳世昌

論語”一名之來歷與其解釋

趙 貞 信

“論語”一名在漢以前的書裏是看不見的。無論是儒家不是儒家的作品，其中儘有引用和在現在論語中的同一的文句，但祇有稱“子曰”“孔子曰”“故曰”等而總不稱“論語”。禮記中的坊記，據沈約說是取於子思子（見唐書音義志上），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史記孔子世家），曾子的弟子（韓愈送王相序）；康有爲說是采之公孫尼子（新學僞經考卷三上），公孫尼子，班固說是“七十子之弟子”（漢書藝文志），隋唐志說“似孔子弟子”。這篇書似乎確是漢以前的人撰成的了，它裏面有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的話。這個“子云”的“子”字，假使照邵晉涵黃以周他們以禮記中表記繹衣諸篇的“子言之”等是子思所說，“子曰”等是孔子所說的例來推，則無疑的這幾句話是孔子所說而“論語”一名不但漢以前的人已經稱用，並且好像論語這一部書在孔子生時就已編成，“論語”這一個名稱春秋時代就已成立了。這真未免太滑稽，想來任何人都不會信的。看了歐陽修的話，我們就可知不但坊記中這幾句論語不是孔子所引，就是論語中“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的幾句話也不是孔子所說。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 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史丹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傳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東陽文忠集三年無改問）

經他這樣一說，坊記中的論語要說是孔子所引，自屬再也無從說起。而論語的編成，漢書藝文志中又明明記載着出於孔子之門人：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門人是弟子的弟子，夫子卒後纔由他們輯而論纂，夫子生時就是要引用論語又何從引用起！所以王應麟說：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困學紀聞卷五）

然則坊記中的“論語曰”是誰引的呢？程子說：

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禮記義疏坊記篇首引）

這是疑漢人賈誼董仲舒襲引的。皮錫瑞說：

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然則坊記表記緇衣之

‘子言之’‘子曰’或即子思子之言，故中有引論語一條。後人疑非孔子之言，解此可無疑矣。（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論）

這是說是子思子引的。日人武內義雄說：

禮記中子思所作之諸篇，引‘論語’者只此一例，其它同引論語，均冠以“子曰”。推測此章之前後文，與中間所引之論語，句語意味相同，恐係後人記於行旁之註語竄入文中者，非子思本來之語。（支那學第五卷一號論語原始）

這是疑係後人之旁註混入正文。這三種說法，子思子引的一說絕不可信。子思是春秋末戰國初時人，如子思能用“論語”之名，何以同他同時和在他以後的人都一用也不用，這是一可疑。照他們所說為子思所作的幾篇，引用論語之文甚多，何以他處均冠“子曰”，而此一處獨冠“論語”，這是二可疑。所以這一說不能成立。說是賈誼董仲舒所引，但在前無人曾說坊記是他們所作，其他又無確據，此說也頗勉強。第三說似乎比較最近情。其實看了毛奇齡康有為的話，即可明白禮記的編成本很遲，且時有附加：

漢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即禮記藍本也。……漢成時劉向校經，始取記百三十篇，以為此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共撰，而增明堂陰陽孔子三朝及王史氏記合得二百十四篇。然猶未名為“禮記”也。沿至東漢始有四十六篇之禮記流傳人間，而馬融直增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凡三篇，合得四十九篇。（經問）

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漢儒林有鄭玄所註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同上）

禮家先師刺取七十子後學記之言禮者為一冊，俾便於考據，

如後世之爲類書者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禮記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問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記表記緇衣采之公孫尼子，三年問采之荀子，保傅禮察采之賈誼，則禮記純采之七子後學可知。五家先師日加附益，故既采賈誼之保傅禮察，公冠並采及漢孝昭帝祝辭，則宣元後先師之所采者矣。

(新學僞經考漢書藝文志辨偽)

西漢時的禮記采及漢孝昭帝的祝辭，材料內容已算很夠晚了。現在的四十九篇禮記，則又出自東漢，經馬融編定而由鄭玄傳下來的一個本子。試想編成得這樣晚的書裏有“論語”兩個字還有什麼稀奇。我們再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中的以旁記字入正文例：

王氏念孫曰，“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趙策，‘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闕’與‘安’古同聲，即董安于也。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董闕安于’”。

周書命訓篇，“通道通天以正人”，按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然則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襄三十一年左傳注，荀子禮論篇注並曰“道，通也”。“道天以正人”即“通天以正人”。疑他本或有作“通”字者，後人旁記於此，傳寫誤入正文，則爲“道通天以正人”，文不成義，乃又於“道”上加“通”字耳。

照第一條例，很可證明武內義雄的旁註混入正文的說法不爲無稽。照第二條例，我想或係後人因“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兩句書出於論語，即記“論語”二字於旁，傳寫誤入正文，覺其文不成義，遂又增一“曰”字於“論語”之下，因成現在的樣式（坊記此條論語係從里仁鈔來，下文

之“急謀不倦，勞而不怨”，“父母在，不稱老”，與里仁之“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在，不遠遊”亦相同。此文下引“高宗云”，如除去“論語曰”，與前後文之子云既畢，即引詩證作結，亦極合。由此可見非全條竄入，確僅增加“論語曰”三字而已。

俞樾還有一種說法，云：

禮記如坊記表記緇衣等篇，其中“子曰”“子云”字均是漢人增益，多可刪除者。（曲園雜纂中庶說）

此不但可以證明坊記中的“論語曰”非孔子所引，亦可證“論語曰”同樣為漢人所增益。

就多方面推勘，如坊記一書成於“論語”一名已通行之後，則可置弗論；如成於“論語”一名未通行之前，則此“論語”二字必非原書所有，殆可斷言。

以上已證明孔子之時決不會有“論語”之名，坊記中之“論語曰”不獨非孔子所引，亦非漢前所有。但儘有人可以不答應，因為還有春秋時代的書裏明引有“論語”。這部書是孔子家語。它裏面有孔安國的後序，說：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聞焉。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為“孔子家語”。

這說得很清楚，孔子家語和論語原本都是孔子弟子的記錄，他們把“正實而切事者”挑出來編為論語，其餘的集做孔子家語。是這兩部書都是孔子弟子所編，當然家語是春秋時代之書。它裏面有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七十二弟子集）

的話，明引“論語”，似乎論語的編成遠在家語成書以前。但不幸為魏博

士的馬昭就說“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禮記樂記孔疏引）。唐時的顏師古也說漢藝文志所載之家語，非今所有家語（漢書藝文志注）。孔穎達也說“家語先儒以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記王制正義）。宋時的王柏也說“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經義考引）。到前清范家相的家語證僞，孫志祖的家語疏證，隋士珂的孔子家語疏證出，此案遂大白。大家已公認今本家語爲王肅所僞作，孔安國的後序也是他所代撰，更無異議。范家相說：

論語非出於家語，即家語已自言之矣。七十二弟子篇曾點傳引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使論語出自家語，安得家語復引論語耶？況家語與論語事文重見者不一而足，豈有一時之撰集而兩取之乎！（家語證僞卷十一讀家語雜記）

翟灝也說：

就肅之說，家語是論語所餘，則兩語不應重襲，而當時不先有“論語”名。今如子謂子賤，子使漆雕開仕，子張問高宗，子路問管仲，子路愠見，葉公問政，齊人歸女樂，魯廢焚等事，皆已在論語，而家語仍由別集攬之。至弟子解叙曾點風浴，竟忘其所以，直標出“論語”名，則與後序言顯不自應，又烏足據之原論語耶！（四書考異卷九論語原始）

這真該怪王肅作僞作得太不小心，既然說論語的材料是在編家語的一堆裏挑出去的，則論語中有的家語中就不該有了。既然說挑出了編論語的材料之後，就把賸下的編爲家語，則賸下的材料都是論語未編以前就有的，爲何當中會有“論語”這個名字？這不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嗎！

僞家語和僞孔安國序既都出自王肅，“論語”一名出於春秋的根據，似乎已根本失却。但還有人說：

案，肅惟取婚姻喪祭郊禘廟祫與鄭不同者尋入家語，以矯誣聖人，

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謂肅所造也。（漢書藝文志補註引沈欽韓語）

這和史繩祖所說大戴係雜取家語之書分析成篇（見學齋佔畢），錢穀所說古本家語即在今本之中（見家語疏證書後）的話一樣。如果可信，安見“論語”一條非來自古本家語？倘作此說，則請試看四庫總目提要及洙泗考信錄：

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爲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于部儒家類孔子家語條）

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識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氏先世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洙泗考信錄卷一）

王柏說家語是肅取左傳國語孟荀二戴記所割裂織成，他們的說法和他相同，可見不但大戴非襲家語，且不僅在古本中插入一些與鄭不同者而止。

謂古本家語已亡，康成亦未之見，爲崔述一人之私言嗎？請再看范家相和陳鍾的話：

鄭氏之學極博，然注經未嘗一引家語，則古家語之亡久矣。（家語
嚴粲禮家語類記）

家語肅以前之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以爲解。（家語疏證序）

古本家語的失傳大概很早，不但王肅看不見，在王肅以前的儒者也早已不看見了。所以今本家語中不會再有古本家語的材料存在了。

王肅造偽書的手段很高，因為要和鄭玄爭勝，造了許多偽書，多數假名於孔安國，家語不過其中之一種。皮錫瑞說：

肅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託於孔子及孔氏子孫，使其徒孔衍爲之證。

不思史漢皆云“安國早卒”，不云有所撰述，偽作之書已與史漢不合矣！（經學歷史經學中衰時代論）

這都是搬出父輩來壓倒孫曾的方法。王肅會假託了孔子和孔氏子孫的名目來壓伏鄭玄，想不到後人也會舉出在他以前的史漢沒有記載安國撰著來證明他的作偽啊！

家語的不可信，自魏迄今喧傳已久，故翟灝不肯據之以原論語。禮記是五經之一，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下註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大家公認今本禮記即由此百三十一篇中出來，其地位既高，源流亦確，自不能不使翟灝信從。同時班固又稱“論語者，……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可知撰禮記的人和撰論語的人的行輩相彷彿。所以他說：

“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四書考異卷十四）

坊記中之“論語”也屬不可信，已如前辨。“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是事實不是呢？劉恭冕對於這點，相信了一半，反對了

一半。他說：

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鄭玄論語序 逸文正義）

這是相信的方面，“論語”一名是門人起的。他又說：

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為得也。（論語序正義）

這是反對的方面，他以為不是門人所論。王先慎駁他道：

案檀弓鄭注，“門人弟子也”。釋文引鄭注，“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劉恭冕論語序正義謂“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以駁漢志，非也。（漢書藝文志補註引）

王氏的意思，以為門人和弟子沒有分別。漢書藝文志上面說的“當時弟子各有所記”的“弟子”即是下面“門人相與輯而論纂”的“門人”。這一說實不可信，門人弟子古時確有分別，前人說得很明白。閻若璩云：

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為二，註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適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是其證也。（四書釋地三續）

這所說的還是漢時的情形，其實春秋戰國時也是如此。朱彝尊云：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弔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二）

俞樾云：

春秋之義，微者書“人”。論語所書有“門弟子”“門人”，門人亦微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夫子曰，“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臣”與“二三子”別而言之，則門人之與門弟子固有異矣。蓋雖同列門牆，而行輩較晚，未敢抗行，故從微者之例稱“人”。如云“門人不敬子路”，又云“子出，門人問曰”，非微者而何？

（湖樓筆談卷一）

這兩條都舉在論語中者爲證，無法可更辨解。所以無論就孔子之門人弟子存在之時代言，或就班固撰述漢書之時代言，均不得謂門人弟子沒有分別。漢志說“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似乎是在解釋所以名“論語”之故，並不是在說明名“論語”之人。翟灝將名“論語”這事歸之門人，實屬勉強。不過這一說並非是他所始創，梁時的劉勰就說：

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此矣。（文心雕龍卷四）

元時的何異孫也說：

孔門惟曾參最少，小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曾子死，則其去孔子也遠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竊意論語一書，曾子弟子爲之而就名之也。（十一經問對卷一）

翟灝和劉鑑所說的“門人”是泛指的，何異孫因承襲了柳宗元曾子弟子編成的說法，就把命名“論語”的人也歸之曾子弟子。這數人都是以“論語”這名爲起於孔子的門人的。劉基冕不但以爲非門人所論，即“論語”之名爲“門人謂之”的說法，亦不過勉強引用。他的真意則主張是孔子的弟子仲弓等所題。他說：

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仲弓等彙集諸弟子所記，勒爲此編。……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鄭玄論語序逸文正義）

說是弟子所題，還有比陸德明更前的皇侃：

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立體者，則謂之爲“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跡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論語義疏敘）

這裏和前面一樣，陸德明和皇侃所說的弟子是泛指的，劉恭冕因有鄭玄說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的成見，就把起“論語”這名的事也歸之他們。自皇侃劉懿到翟灝劉恭冕，雖有弟子題門人題的議論不一，但總有一條共通的例，就是猜測是誰編纂這書便屬誰替此書起名。這完全是以後世撰書起名的方法來例之古代的。不知道漢以前是沒有自己命名的書的；更不知道在沒有命名為“論語”以前，這書是怎樣的幾堆竹簡？在春秋戰國時這書的最初的原本材料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怎樣慢慢地有意無意的聚集成冊？這些事情，說來話長，且俟後談。但如果“論語”一名確為孔子的弟子或門人所起，則自春秋至漢初遙遙三百年中何以並無一人稱用？他人姑不論，儒家的權威孟荀二大師書中所引論語中語並不少，何以總不記“論語”二字？二戴禮記可稱一部儒家叢書，篇帙總不能算不多，何以也除却坊記中一條可疑的以外再也不見有第二條呢？所以儘管他們議論紛紛，猜測這個題那個題，我們總不信“論語”之名會起於孔子的弟子或門人的！

* * * * *

坊記和家語不可憑，前人紛紛揣測之說又不足信，“論語”一名究屬起於何時何人呢？王充說起於西漢的孔安國。論衡正說篇：

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這說得最明白沒有了，是孔安國教魯人扶卿的時候起的。孔安國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史記沒有替他立傳，祇在孔子世家的末尾附帶記了幾句，說，“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驥”。漢書也沒有替他立傳，祇在儒林申公傳說他是申公的弟子，孔光傳說他“曰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因為他是孔子的後裔，又是尚書博士，所以使得西漢末年的劉歆要利用他，曹魏時的王肅也要利用他。把一部尚書化

出了兩個化身，還連帶發生了許多問題。累得許多學者寫禿了無數管筆，污損了無數張紙，到現在仍舊有已經弄清楚的，也有還沒有弄清楚的。他的生卒年他處無可考，惟家語附錄的孔安國傳說他曾受書於伏生，年六十卒，似乎可定他生於文帝十年（前一七〇）左右，卒於武帝元鼎（前一六至一一）時。朱彝尊相信這一說。王鳴盛則以和史記“蚤卒”之語不合，故云：

世家載孔氏子孫年皆四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蚤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於安國在元朔三年（前一二六），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前一五〇左右），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前一〇左右），此爲定論。（尚書後案）

這是用史記的“蚤卒”來推翻家語附錄“六十”之語，而用兒寬受業於安國之年來定安國爲博士之年，即以此年推定其約略的生卒時期。王國維的說法略與此同，但語意似比王鳴盛所說之時期稍前數年：

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驥”，既云“早卒”，而又及紀其孫，則安國之卒當在武帝初葉。以漢書兒寬傳考之，則兒寬爲博士弟子時，安國正爲博士，而寬自博士弟子補廷尉文學卒史，則當張湯爲廷尉時。湯以元朔三年（前一二六）爲廷尉，至元狩三年（前一二〇）遷御史大夫，在職凡六年。寬爲廷尉史，至北地視畜，數年始爲湯所知，則其自博士弟子爲廷尉卒史，當在湯初爲廷尉時也。以此推之，則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間（前一三〇左右）。……然安國既云“蚤卒”，則其出爲臨淮太守，亦當在此數年中。

（觀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

此考很精核。大抵安國生於文帝末葉(前一六〇左右)，卒於武帝初葉——元朔元狩間(前一二〇左右)，——年約四十左右。我們所能知道他的事情，除了漢書藝文志及史漢儒林傳說他多得逸書十六篇及司馬遷從他問古文尚書這一件今古文上的大公案外，大概就只有這一點。

“魯扶卿”這個名字則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張禹傳：

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鼎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漢書卷三十一藝文志)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漢書卷八十一張禹傳)

就此可知他是傳魯論語的。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記雖和此相同，但他說鄭玄本的“扶卿”係作“扶先”。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鼎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府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之竝傳之，各自名家。

(經典釋文敘錄)

宋翔鳳說，“所引鄭云，當出論語序”(論語鄭注卷十論語叙)。“先”字作“先生”解，史漢並有其例：

臧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

“‘先’，即‘先生’”。(史記卷一百一臧錯傳)

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

也”。(漢書卷四十九臧錯傳)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

“卿”字也可作尊稱：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史記卷八十六刺客列

傳)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補註：先謙曰，“戰國人發聲人曰‘卿’，漢世遂爲常語，下文捕賊‘兩卿’是也”。（漢書補註卷七十六趙廣漢傳）
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琊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

（四書考異卷十一）

照這些來看，‘魯扶卿’這個名字很有問題。還是姓魯名扶卿呢？（如漢志）還是魯人姓扶名卿呢？（如正義篇）還是姓魯名扶先（如鄭云）或魯人姓扶人稱之爲“卿”或“先”呢？武內義雄說，正義篇“魯人扶卿”之“人”字衍”（論語原始）。劉恭冕說：

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論語序正義）

他們都不以王充之言爲然。由我推測起來，王充的話和漢志鄭玄都不衝突，確是魯人姓扶人稱之爲“卿”或“先”。這可分幾點來證明。漢志說：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王吉，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臧孫，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在諸人姓名之上皆冠以官名，傳齊論之庸生無官名，則冠以“膠東”之地名，以此例傳魯論亦無官名之扶卿，所冠之“魯”字當亦爲地名。更觀何晏所引的劉向別錄，亦同此例：

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